

·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

拉班·扫马和马克 西行记

伊儿汗国（佚名）著
「中」朱炳旭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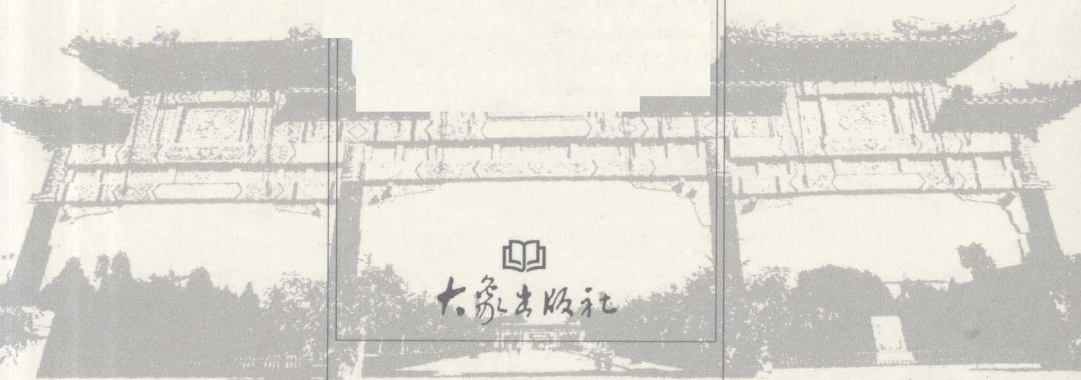


大象出版社

·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

拉班·扫马和马克 西行记

伊儿汗国（佚名）著
「中」朱炳旭 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班·扫马和马可西行记/朱炳旭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9. 3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ISBN 978 - 7 - 5347 - 5319 - 0

I. 拉… II. 朱… III. 拉班·扫马(1225 ~ 1294)—传记 IV. B97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1384 号

拉班·扫马和马可西行记

责任编辑 王莉娜

责任校对 石更新

装帧设计 张帆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4.25

字 数 90 千字

定 价 1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总序

任继愈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世界知道中国,不自今日始,回溯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共有五次高潮。^① 文明交流的深度、广度也是近代超过古代。

中外文化交流,也循着文化交流的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化水平高的一方会影响文化水平低的一方,文化水平低的一方则比较容易成为接受者。中国古代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往是施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其间也有双方文化水平相当,接触后发生冲突,然后各自吸收有用的,并使它为我所用的情况。这种水平相当的交流,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收到互相融会、双方受益的效果。进入近代,中国科技领域在国际不再领先,往往借助外来文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明中期,如天文、历算,往往学习西法,这就是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又一个实例。

文化交流、交融、吸收、互补,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在国力充实、文化发达、科学先进的情况下,才可以在交流中采取主动,吸取

^① 第一次在汉朝,公元前后1世纪,开通了丝绸之路;第二次在唐朝,公元7—8世纪;第三次在明朝,公元14—15世纪;第四次在清末鸦片战争前后,19世纪;第五次在“五四”前后,20世纪初到现在。

其可用者为我所用。当国势衰弱、文化停滞、科学落后时,往往在交流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失去对外来文化选择的主动权,成为完全被动的接受者。鸦片战争以后,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有些是我们主动吸收的,也有些是中国所不愿接受的,也有些是被迫引进的。

历史告诉人们,当前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世界上一个地区出现了经济危机,全世界都会受到震动。文化方面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紧密的程度,却也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当前文化交流的条件大大超过古代,传递手段之迅捷,古人无法想象。因此,文化交流的责任也远比古代社会沉重。“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负担着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艰巨任务。

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

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翻译);

二、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翻译);

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

“汉学”这一名称,国内外学术界多数人认同,也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准备用很多精力界定这个名词,我们只是把过去和现代人们已发表的和正在从事研究的这一类译著汇集起来,总之,都属于中国文化这个大范围之内的学术著作。正如“现代新儒家”,这个名字的内容,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使用标准。因为它属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本书系也将包括这类译著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愿借这个领域,作为联系海内外研究古今中国文化的桥梁,为人类精神文明略尽绵薄之力,我们的初衷就算达到了。

我们这套书系,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类未来负责的心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向中国展示健康、高品位的世界文化。21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总结历史成果的时代。我们以科学的良心,如实向世界推进文化交流,我们介绍古代先驱者的业绩,在当代人中,沟通各国文化的精华,展望人类未来的光明前景。

只有在健康、光明、理性、科学为主干的文化指引下,人类才可以避免失误,走向和平。每一个经历过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深知和平的可贵,战争的罪恶。我们从事文化事业的、正直善良的学者,出版这套书系,期望其社会效益不限于书斋以内,更寄希望于提高全人类的文化素质,泯除非理性的强权暴行,引导社会走向和平、光明的大道,为中华民族积累精神财富,为世界人民增加友谊与理解。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编辑委员会

- | | | |
|-------|---------------------------|-----------------------------|
| 顾问: | 陈乃芳 (Chen Naifang) | 陈翰笙 (Chen Hansheng) |
| | 季羨林 (Ji Xianlin) | 李学勤 (Li Xueqin) |
| | 饶宗颐 (Rao Zongyi) | 汤一介 (Tang Yijie) |
| | 王元化 (Wang Yuanhua) | 周一良 (Zhou Yiliang) |
| 主编: | 任继愈 (Ren Jiyu) | |
| 执行主编: | 张西平 (Zhang Xiping) | 周常林 (Zhou Changlin) |
| | 耿昇 (Geng Sheng) | 杨煦生 (Yang Xusheng) |
| 编委: | 柴剑虹 (Chai Jianhong) | 程裕祯 (Cheng Yuzhen) |
| | 高建平 (Gao Jianping) | 何其莘 (He Qishen) |
| | 李明滨 (Li Mingbin) | 孟华 (Meng Hua) |
| | 任大援 (Ren Dayuan) | 黄勃 (Huang Bo) |
| | 吴隽深 (Wu Junshen) | 谢方 (Xie Fang) |
| | 严安生 (Yan Ansheng) | 阎纯德 (Yan Chunde) |
| | 严绍璦 (Yan Shaotang) | 杨保筠 (Yang Baoyun) |
| | 张德鑫 (Zhang Dexin) | 张国刚 (Zhang Guogang) |
| | 周发祥 (Zhou Faxiang) | 汪前进 (Wang Qianjin) |
| 国际编委: | 李福清 (Boris L. Riftin) | 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
| | 孟德卫 (David E. Mungello) | 许理和 (Erik Zürcher) |
| | 常志静 (Floria C. Reiter) | 杜德桥 (Glen Dudridge) |
| | 陈志让 (Jerome Chen) | 施舟人 (Kristofer M. Schipper) |
| | 谢和耐 (Jacques Gernt) | 柳存仁 (Liu Ts' un-yan) |
| | 钟鸣旦 (Nicolas Standaert) | 罗致德 (Otto Ladstätter) |
| | 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 | 史华罗 (Paolo Santangelo) |
| | 安乐哲 (Roger T. Ames) | 陈荣照 (Tan Eng-Chaw) |
| | 罗多弼 (Torbjörn Lodén) | 杜维明 (Tu Weiming) |
| | 弥维礼 (Wilhelm K. Müller) | 伊维德 (Wilt L. Idema) |

中文版序

二十余年前,朱炳旭(原名朱炳耀)君就读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时,曾听过我开设的“英文历史原著选读”课程。自思当时的英语水平并不高(至今恐怕亦然),之所以开设这门课,一是确实特别认可马克思的名言“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故十分希望年轻的大学生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今日之所学;二是因为自己除了在史学方面略知一二外,总算还稍稍有些外语“特长”,从而不无“卖弄”一下,混碗饭吃的意思在内。但我当时对这门课的效果,从未寄予很大的期望。

然而,近日与相别多年的朱君重建联系后,获悉他竟因听我的课而“找到了感觉”,并在嗣后也“仗着这门看家本事混饭吃了”(语见本书“后记”),于是大有“喜出望外”之感。这不仅为自己昔日“插柳”的意外收获而高兴,更为朱君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而高兴。尤其值得赞赏的是,朱君完全出于兴趣爱好,充分利用了本可“轻松轻松”的时间,加压于自己,译出了本书。这与当前普遍流行的功利做法完全背道而驰,但于学术与文化建设却十分有利,所以我对此举是颇具敬佩之心的。

正因为怀着这样的态度,故当朱君要求我为此译著写篇序言时,我并未拒绝,而是声称“尽力而为”。将近三十年来,我忝为“专业人员”,从事历史研究,而专业的范围正是古代中西交通史。我对

拉班·扫马的事迹有所了解,但是并无研究,因为我的专业重点是在汉唐时期,对于蒙元以降的时代,则非我长。虽然,我仍很愿意不揣谫陋,为朱君的译著作序。一方面为了不负朱君之望;另一方面亦有意于向读者郑重推介这份甚有价值的古代东西交流资料,特别是希望引起中国学者和一般读者的注意,使其作用得到应有的发挥。

拉班·扫马的事迹被学术界称为“逆向的马可·波罗”,盖因与之同时代的马可·波罗曾发自意大利,经今伊朗、中亚等地,从新疆入境,前赴元朝的北方都城“上都”(原称开平,故址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北),其旅行路线显然是自西向东。而拉班·扫马则发自“大都”(即今北京),循陆路西进,经今新疆、中亚,而至伊朗、伊拉克;后又奉命出使今土耳其、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地。他自东而西,旅行方向恰与马可·波罗逆向,故获“逆向的马可·波罗”之美誉。

尽管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拉班·扫马的形象远不及马可·波罗“高大”,其事迹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也远低于马可·波罗,但是他对于东西交往的贡献,却未必逊于马可·波罗。因为马可·波罗只是为了商业利益而东行;而拉班·扫马作为虔诚的景教徒,却是为了赴耶路撒冷“朝圣”才西行的。此外,他嗣后虽然朝圣未果,却曾奉伊儿汗国阿鲁浑汗(统治伊朗的蒙古族人)之命,出使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罗马、热那亚、巴黎、波尔多等地,旨在联合欧洲的基督教徒,他对于欧亚之间宗教事务的涉足之深,远胜于马可·波罗。

偕同拉班·扫马一起西行的弟子马可,曾被景教(聂斯托利派)总主教任命为“契丹与汪古教区主教”,拉班·扫马本人则被任命为巡视总监,两人的宗教地位都不低。后来,拉班·扫马率团出使欧洲,在那不勒斯晋见过伊利德·萨尔达罗(Irid Shardalo)国王;在罗马与红衣主教作过精彩的学术讨论;在巴黎晋见过法兰西国王;在瓜斯科尼(Guascogne)晋见过英国国王。如此频繁和积极的外交活动,显然比马可·波罗的事迹更为杰出和辉煌。至于拉班·扫马的弟子马可,在被任命为东方教会的主教(改称雅巴拉哈三世)后,则花费

了大量精力,与蒙古人的朝廷展开外交接触,试图使其教徒免受穆斯林统治者的折磨、劫掠,乃至屠杀。

显而易见,拉班·扫马和马可(雅巴拉哈三世)在欧亚的外交和宗教事务中的作用绝对不容小视,所以,记述他们这些活动的本书,也就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既可供一般大众了解当时的史实,也有助于学者做更加深入的学术研究。因此之故,朱君翻译本书,实是一件“积德”的学术善举。译著虽然删除了英文原著颇有意义的《导言》部分,不免有些可惜,但我相信,它仍会受到读者们的好评和欢迎。

芮传明

2007年7月20日于上海

译者序

此书是元代忽必烈时期的两位著名的景教人士雅巴拉哈三世(马可)和拉班·扫马西行历史的最原始的记录,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许多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中外专著都要提到此二人,但都是很不完整、无法窥全豹的转述,而这本当时人记载他们当时事的著作至今没有一部完全的中文本行世,致使此两位中西交通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的事迹根本不为普通老百姓所知,只是在学者中间流传,而且只是泛泛之谈。至于此书所反映的伊儿汗国历史、中东景教史及伊斯兰教和景教之力量消长史、两位景教旅行家的中东游记尤其是拉班·扫马的欧洲游记,都还沉睡在著作里面,无人知晓,以致两位西行僧人的知名度远远比不上东来之马可·波罗,故我翻译此书大概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此书底本是叙利亚文著作,作者姓名已佚无考,德国学者鲍姆斯塔克(Baumstark)认为,文书作者可能是雅巴拉哈大总管生平诸多事件的目击者,大概于14世纪中叶写成该书。我是根据威利斯·布哲的英文全译本翻译过来的。叙利亚文著作在当时伊斯兰教大力反击景教势力的情况下,写成后一直没有公布,而以手抄本形式暗中流

传,故几百年间,人们所见之二位景教僧的唯一记载是巴尔·赫布若斯所编《基督教编年史》第三卷第451辑,此书为波斯文写成,因作者于1286年去世,故其后直到1317年雅巴拉哈大总管的情况和拉班·扫马的境遇在《基督教编年史》中均无记载。

直到1887年3月,叙利亚文手抄本才被重新发现。当时,库尔德斯坦一位穷困潦倒的占星家所罗门(Salomon)在特克哈马(Tekhamma)发现一年青的土耳其景教徒手中有本叙利亚文手抄本,便借去阅读,不意竟是巴尔·赫布若斯所提两名景教僧侣的行纪和传记,所罗门便在乌尔米牙(Urmayah)将文书制一复本,送于拜占神甫。拜占发现文书内有许多错误,便进行校订工作。他指出几处词语遗漏和多页原文可疑之处,并通篇校正专有名词的拼法,增添正确元音,并用叙利亚文作了注释。做完这些工作,他便印刷全文,著名的叙利亚学者卢本斯·杜瓦尔(Rubens Duval)审读了校样。1888年,该版本在巴黎出版。此后不久,拜占又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得到了叙利亚文书的其他一些抄本。鲍姆斯塔克认为,拜占所用文书的大部分是从特克哈马聂派大总管拉班·瑜蓝(Rabban Yonan)所占有的文书抄写而来。此人生于库尔德斯坦的明格尼西(Minganish)村。经过几年努力,拜占终于在1895年在巴黎和莱比锡出版该叙利亚文书的校订本,书名为《大总管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传》。

1888年11月29日,也就是拜占首版该叙利亚文行纪的那一年,大英博物馆从乌尔米牙美国传教团之J. H. 谢德(J. H. Shedd)牧师处购得一份叙利亚文抄本,共七十张,该书书写工整,行文通达,然而,遗憾的是,其内容拜占神甫已于该年头几个月公布了,此文书为东方3636号(Oriental 3636)。

1896年,基斯蒙德于罗马出版了阿拉伯文雅巴拉哈小传,附有拉丁文译本,两卷本,书名为《阿姆鲁斯和斯利巴论景教派大总管》(*A'mriet Slibaede Patriarchis Nestorianorum Commentaria*)。

其实,第一个认识到拉班·扫马和马可传记的重要性的学者是H. H. 豪(H. H. Hall)教授。早在拜占之前,他便在《美国东方学学会

年鉴》(*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6—129 卷(1885—1888 年)和东方学学会出版的杂志第 13 期(1889 年)中发表了他自己对该传记的意见。1885 年,他得到了一种叙利亚文《拉班·扫马和马可(马·雅巴拉哈)传》,便在美国出版其节译本,但是,该版本未能流通。

1885—1887 年三年间,乌尔米牙的美国传教士将该历史著作的一部分译成 Fallaehi 文,逐月发表在他们的定期杂志上。其所版之译本 *Zahrre dhe bahra*, 因没有人能识 Fallaehi 文而无效,此语为库尔德斯坦的近代叙利亚方言。

1889 年,研究该传记的文章开始发表,研究者主要有以下几人:一、杜瓦尔,《亚洲杂志》(*Jour. Asia*) 第 13 期,第 313 页以下。二、拉米,《比利时学院学报》(*Bulletin of Belgian Academy*) 第 17 期,第 223 页。三、冯·霍涅克(Von. Hoonacher),《博物馆》(*Museon*) 第 8 期。四、努尔达克(Noldeke),*Literarisches Centralblatt*, 第 842—844 辑。五、希哲菲德在其 *Bemerkungen*(耶拿,1894 年)中探讨了原文。

法国学者艾比·夏博(Abbe Chabot)首译拜占原文,先在《东罗马评论》第一卷,第 567 页、610 页以下及第二卷第 73—142 页、223—243 页上发表之,后于 1895 年在巴黎成书,名为《马·雅巴拉哈三世传》(*Histoire de Mor Jabalaha III*)。因为拜占的叙利亚文校订本是在 1895 年年底才出版的,故我们可以肯定,夏博的译本一定是根据 1888 年首版之叙利亚文。夏博以注释形式增加了一条珍贵纪事,内中大段引用霍沃斯和摩拉地亚·道生(Mouradja Dohsson)之标准蒙古史和 1865 年巴黎版之《马可·波罗游记》颇节本(Pauthier)。在两个附录中,夏博提供了蒙古王和教皇及拜占廷、法兰西、英格兰诸王来往书信的拉丁译文和一份马·雅巴拉哈三世于 1308 年交教皇本尼狄克(Benedict)十一世之重要信件的拉丁译本。夏博通篇注释中的短引皆为精选之教会资料,大大增加了叙利亚文译本的价值。正是夏博,让全欧普通群众了解了忽必烈汗的僧侣使者的史实。

1924—1925 年冬,英国学者威利斯·布哲根据夏博的法译本译

成英译本,但1925年译本之出版计划受挫。1927年夏,布哲将其译本转让于《宗教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主编、神学博士C. H. 阿尔文(C. H. Irwin)牧师。1928年3月初,布哲完整的英译本在伦敦问世,名为《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两个僧侣》(*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①。这是首家出版的英文全译本,但是,由于布哲的英译系根据法文译本来的,而法译本的一个遗憾之处是没有能够根据拜占神甫的第二版校订本进行翻译,所以内容虽然全,但并不完美。

早布哲一年,即192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 A. 蒙特戈麦利教授在纽约出版了《雅巴拉哈三世史》(*History Yaballaha III*)。他仅将两位中国景教僧侣的传记的上半部译成英文。

1932年,佐伯好郎根据布哲之英译本译成日文。1966年,香港学者罗香林参照布哲英译本和佐伯好郎之日译本而有中文本《元代景教大德西行伟绩记》,但只是取自己所需的节译,并不全面,故中国人还是不能得见叙利亚文书的全貌,如此,也就给了我一个翻译此书的机会。

二

我所据之英译本书名《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两个僧侣》,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布哲所写之《导言》(*Introduction*),后一部分才是此书之英译本《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传》(*The history of Rabban Sawma and Mar Yabhbh-Allaha III*)。前部分《导言》非常长,和译本的长度几乎相等,有The Nestorian Christians and their doctrines, The heresy of Nestorius, Progress of Nestorianism, The conversion of Tur-

① 布哲的书*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Emperor of China*的中文译名已有定译,在郝镇华翻译的《一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第一版)中作《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两个僧侣》,见该书第108页注释②。

kestan, Downfall of the Nestorian church in China, The creed of the Nestorians, The travels of the Chinese monks, The Paizah or Bull of the Mongol Kings, The travels of Rabban Sawma in Europe, Sawma returns to Mongolia, The Patriarchate of Mar Yahbh-Allaha III; The IL-Khans of Persia, The decline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The modern Nestorians, The creed of Mar Yahbh-Allaha III 等十五节,尚有附录 A (Appendix A)和附录 B(Appendix B)。

附录 A 有这样几个内容: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Mongol Empire, The Mongols and Christianity, The Mongol language, The progress of Muhammadanism。附录 B 的内容是 The Nestorian stele at His-an-fu。

从这些部分的题目来看,布哲主要谈聂斯托利派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衰落、拉班·扫马和马·雅巴拉哈在中东的经历、伊儿汗国的历史。他写这些东西的年代在 20 世纪 20 年代,而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早已超越他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两位中国宗教旅行家传记的重要性,所以我忍痛舍弃了布哲的《导言》,而专译后一部分叙利亚文书之英译本,这样一来,此译著的厚度就没有多少了,但它毕竟是一部有自己面貌的独立的中文译本。此译书名既不用布哲的书名《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两个僧侣》,亦不用叙利亚文书原名《马·雅巴拉哈三世和拉班·扫马传》,而取《拉班·扫马和马可西行记》,亦是站在我们国家的立场和视角上的。

三

拜占公布的这本叙利亚文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其记载的有关两位中国景教僧侣在伊儿汗国和欧洲活动的大量历史资料在中文典籍里是无处可寻的。该著作记述了波斯伊儿汗国的历史及其与基督教徒的关系史,并向我们提供了导致波斯、中亚、美索不达米亚景教会衰落的全部历史事件的细节,对研究我国元代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儿汗国的历史,中东、西亚地区的基督教史和宗教斗争史,元

代中西交通史,甚至当时的欧洲历史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而且,通过这本原著,我们可以澄清一些国内外中国基督教史书对此二僧情况叙述的一些错误。

例如,我见到的刘义棠《维吾尔研究》、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台湾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美国凯恩斯·斯科特·拉托洛德《中国基督教史》等几种专著均指称拉班·扫马和马可两人为畏兀儿人,从原著来看,这种说法找不到十分有力的支撑,只有拉班·扫马一个人可以确认是畏兀儿人,而马可的情况更倾向于蒙古人。其实,书里能够确定拉班·扫马是畏兀儿族的证据只有一条,就是此书里讲到拉班·扫马的父亲名曰昔班,《元史》里有《昔班传》,此昔班为畏兀儿人,如此而已。至于马可,书中没有透露任何可以证明他是畏兀儿人的蛛丝马迹,倒是都在告诉我们他与蒙古人的密切关系,因为书中多处提到马可与蒙古人的关系和他通蒙古语。

两人都是畏兀儿人的说法最早来源于巴尔·赫布若斯的《基督教编年史》,对这一说法,伯希和在1914年已发表文章表示了疑义,文章载《通报》1914年第630—636页。阿克·穆尔同意此意见,他在《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的一条注释里说:“各种迹象表明,至少马可可能是一个汪古部人(Ongut)。”^①在该书的另一条注释里,他又说:“汪古部是马可出身的部落,位于山西北部。”^②汪古部信奉景教,在唐时为沙陀突厥,后归附辽、金,汪古部与蒙古的关系很近,两族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通婚,从它的另一个名称“白鞑靼”可以看出,汪古部似乎更接近蒙古人,而不能与畏兀儿画等号。

还有一点很重要,有些书把拉班·扫马和马可说成是忽必烈的使节而西行的,显然于史无据。此书透露出来的史实告诉我们,他们两人完全是以宗教徒的身份、抱着宗教徒的虔诚心情而向西行进的,

① 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10页。

② 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120页。

路上还遭到蒙古王的劝阻。从某种意义来讲,他们的西行和盛唐时期玄奘的西行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没有经过当局的认可,唯一不同的是,玄奘比他们受的磨难更多而已。

此书给我的一个感受是,蒙古统治者的信仰基础非常薄弱,继波斯王位、建立伊儿汗国的是成吉思汗的儿子旭烈兀,第二代国王是旭烈兀之子阿八哈王,而到阿八哈死后,其弟阿合马王即开始改变信仰,接受伊斯兰教,也就是说,伊儿汗国的第三个国王、旭烈兀的第二代已开始改变蒙古人的意识形态。

四

此书应该看做是我们了解景教的好教材,拉班·扫马在罗马与红衣主教们的一番辩论,其实是有关景教教义与罗马天主教之间不同之处的很好宣示,为我们保留了很详细的景教教义方面的资料。

景教,又称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其教义约有下列两端:一、圣母所生非天主圣子降生之人,天主圣子乃结合于圣母所生之人。其结合乃伦理者(Moral),而非著形者(Physical)。因此,圣母不能称为天主之母,仅为天主圣子所结合之人之母。二、基督有二体,一为有形可见之人,一为无形不可见之天主圣子,故基督虽人而亦称天主。因此,基督乃人体而为 Theophore 者,Theo 神也,Phore 盛也,意谓基督为盛神之器,而非真神。

聂斯托利派与罗马加特力派分离后,其特殊之点约有:一、既不承认玛丽(Mary)为天主之母(Mother of God),故不拜玛丽,此点最与希腊及罗马天主教相异。二、不用偶像,保留十字架。三、不承认罗马派之死後涤罪说(Doctrine of Purgatory),然其自其圣徒名簿观之,聂斯托利派似允许奉祀祖先。四、反对化体说(Theory of Transubstantiation),然而承认分圣餐(Eucharist)时,耶稣基督实来光临。五、行监督制,教士共分八级。最高级为教务大总管或宗主教(Catholicus or Patriarch);第二级为总主教(Metropolitan);第三级为